

本书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
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

现代传播译丛

华夏出版社

传播 .. of Communication

在政治和经济的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张力下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 ◆ 著

胡正荣等 ◆ 译

[加拿大]文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传播： 在政治和经济的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张力下

传播政治经济学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加拿大)莫斯科(Mosco, V.)著;胡正荣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书名原文: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SBN 7-5080-2180-0

I. 传… II. ①莫… ②胡… III. ①传播学:政治经济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181 号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by Vincent Mosco

Copyright © 1996 by Vincent Mosco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为 Sage Publications, Inc. 于 1996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1954 号

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

[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科 著

胡正荣 张 磊 段 鹏 付春怡 洪 丽 宋 菁 译

策 划:刘 力 蔡 翔

责任编辑:裘挹红 蔡 翔

封面设计:闫志杰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730×988 16 开

印 张:18.75

字 数:308 千字

定 价:35.00 元

总 序

我们知道,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开展伊始,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过。

最早的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我们尚能每每从《修辞学》或《论语》中找寻到对传播现象研究的精辟论断。

虽然早期的传播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后人珍视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它们都不可能实现传播研究向传播学的转化。这种转化实际上是一种飞跃,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

真正认识到传播活动的本质,利用自己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1949年,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编辑出版了《大众传播学》,第一次提出大众传播学的框架,汇集了前人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成果,它标志着大众传播学正式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人们在对大众传播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范畴和理论体系普遍化,继而形成了传播学。

传播学的诞生与壮大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宏观上,现实社会及经济形态中信息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高,信息流动带来的价值和效益越来越大;微观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传播媒介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愈发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们日益关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传播的规律。另外,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为传播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几十年来,传播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不断壮大。美国的传播学以其实证、定量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体系庞大、成熟且关注现实的学科特点;欧洲的传播学以思辨、定性的研究为专长,蕴涵深刻的思想,敏锐而具有批判性。当代传播学研究如何适应社会形态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播形态的进化,不断地调整自己,加快发展,业已成为全球传播学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社会上及学术界对传播学的认识程度不高,目前只是处于传播学研究的初级阶段。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刊物《新闻大学》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一方面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另一方面则建立基础,调整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致力于深化本土的传播学研究。毋庸置疑,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无到有,确实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这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已经确立位置。

但是,在中国传播学界空前发展的繁荣景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传播学发展迅速,成果不断,但我国全面而忠实的译介甚少,而且,在目前为数不多的译著及译文中,仍然存在误读之处,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对初学者产生一定的误导。

为了使我国的传播业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当前迫切需要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系统介绍国外先进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优秀教材,以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传播工作者,推动我国传播业的发展;强化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繁荣传播学研究,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与具有远见和紧迫感的华夏出版社精诚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遴选书目、洽谈版权、商定体例到布置工作等一系列的繁冗事务。

为了本译丛能够高质量的出版,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

首先是书目的选定问题。我们的原则是,首选那些经过教学与实践严格检验,在西方传播学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优秀教材和经典专著。既要有传统学派、批判学派的名作,也要有针对学理与学术在不同层面所作的思考。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传播学在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在不同形态下的传播实务进行的探索。

其次,在翻译的组织上,尽力为每一本书审慎地选择合适的译者。他们中既有多年从事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授,也有留学国外的博士及中青年学术骨干。在要求信、达、雅的前提下,严格遵循学科规范,精益求精。

最后,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要求以教材的高质量标准,在编校、设计、版式、开本、材料、印刷等诸环节严格向国际标准看齐,从而使一本好的原著,经过认真的翻译,出一本好书。

译丛的第一系列已经与读者见面了。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固然可喜,然而,前面的路还很长。无论是译介国外的已有成果,还是进行本土化的自主研究,我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我們不懈地努力。由于受我们的认识水平及信息所限,可能还有一些好的传播学著作暂时未能进入这个译丛。好在我们立志将长久地致力于传播学教材及专著的翻译、编写与出版,因此,这个译丛是开放式的,欢迎各界专家、学者给我们推荐更好的传播学著作;我们也衷心地欢迎有识之士的参与,让我们不断努力,把这个工作共同做好。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编委会

1999年12月

谢 词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变化势态的书。本书最初酝酿于前南斯拉夫,也就是现在的斯洛文尼亚。1990年8月,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在布莱德湖畔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我在与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柯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及SAGE出版社的史蒂文·巴尔(Stephen Barr)的数次闲谈中,激发了撰写本书的热情。在此,我对他们二位在我写作期间给予的长期的、耐心的支持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费时费心地给我指点和批评,这本书的创作就无法完成。首先,我要感谢接受我正式采访的人们。他们就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前景知无不言,侃侃而谈,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人包括(以接受采访的时间为序):已经过世的达拉斯·斯密塞(Dallas Smythe),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三代传播学者;俄勒冈大学的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誉退休教授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前主任、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前会长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拉夫伯勒大学的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格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的托马斯·古贝克(Thomas Guback);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感谢你们花费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你们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感谢你们坦率地说明了传播学研究的现状。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在本书的各个准备阶段向我提供了极有助益的建议、想法和批评。他们是:珍妮·爱伦(Jeanne Allen)、罗伯特·巴比(Robert Babe)、杰克·班克斯(Jack Banks)、罗纳德·贝提格(Ronald Bettig)、奥立佛·波伊德-巴瑞特(Oliver Boyd-Barrett)、彼得·布鲁克(Peter Bruck)、威廉·巴克斯顿(William Buxton)、安德鲁·卡拉布里斯(Andrew Calabrese)、列文·乔巴坚(Levon Chorbajian)、安德鲁·克莱蒙特(Andrew Clement)、华莱士·克莱蒙特(Wallace Clement)、托马斯·库帕(Thomas Cooper)、亚瑟·考代尔(Arthur Cordell)、杰拉尔德·考特(Gerald Coulter)、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苏珊·戴维斯(Susan Davis)、马杰里·弗格

森(Marjorie Ferguson)、奥斯卡·甘地(Oscar Gandy)、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吉尔·希尔斯(Jill Hills)、苏·柯里·詹森(Sue Curry Jansen)、约翰·伦特(John Lent)、爱琳·马奥尼(Eileen Mahoney)、米歇尔·马丁(Michèle Martin)、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史蒂芬·麦克多威尔(Stephen McDowell)、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爱琳·米汉(Eileen Meehan)、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安东尼·奥庭格(Anthony Oettinger)、曼朱奈斯·潘达库尔(Manjunath Pendakur)、柯林·罗奇(Colleen Roach)、爱琳·桑德斯(Eileen Saunders)、丹·席勒(Dan Schiller)、舍德·施尼亚德(Sid Shniad)、弗雷德·斯派罗尼斯(Fred Sperounis)、杰拉尔德·苏斯曼(Gerald Sussman)和德温·温赛克(Dwane Winseck)。

卡尔顿大学的几位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为我提供了出色的帮助和建议。他们是:卡拉·布朗(Carla Brown)、安东尼·费拉(Anthony Ferrare)、路易斯·凯(Lewis Kaye)、帕特里西亚·曼泽帕(Patricia Mazepa)、罗杰·派里特(Roger Perritt)、安德鲁·瑞迪克(Andrew Reddick)、凡达·瑞迪欧(Vanda Rideout)、欧罗拉·沃利斯(Aurora Wallace)及温迪·扎提尼(Wendy Zatylny)。卡尔顿大学图书馆的南茜·派顿(Nancy Peden)为我查阅各种资料,并将她认为可能有用的材料也一并送来。与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实在是一桩赏心悦事:他们不仅收集你所指定的材料,并且还预计和查找你可能需要的材料。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有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文或参加我的政治经济学研讨班的学生们。他们的见解、批评和支持令我获益匪浅。

本书的完成有赖于加拿大社会科学人文研究会提供的资助,从而解决了研究助理、差旅、研究材料的费用,并使我得到一年的休假时间可以专心写作。我因此特别感谢卡尔顿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尤其是安妮·伯格(Anne Burgess)的帮助,在她的指点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申请到这笔资助。我也要感谢盖尔·穆顿(Gail Mutton),他是我的资助金管理人。卡尔顿大学还以研究奖的形式为我额外提供了一年的假期。人文学院前院长詹妮丝·叶顿(Janice Yalden)及她的后任 G. 斯图亚特·亚当(G. Stuart Adam),还有新闻传播学研究所主任彼得·约翰森(Peter Johansen)都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许多机构向我提供了检验我的想法和研究策略的机会,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年度沙普讲座(Sharpe Lecture)引发我首次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对当代传播

和信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哈佛大学的信息资源政策计划慷慨地为我提供了驻校学者的职位。此外,还有不少组织邀请我就这一课题发表演讲或举办研讨会。它们包括加拿大信息研究协会、加拿大图书馆协会、伦敦城市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穆伦伯格学院、西北大学、渥太华大学、纽约市立皇后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威斯敏斯特大学。

我要特别感谢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来自各界的传播学者,包括专攻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在此如鱼得水。我有幸担任了该协会政治经济学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协会数次会议中展开的热烈讨论令本书获益良多。

我衷心感谢向本书提供帮助的人们,而本书内容则由我本人单独负责。

目 录

谢 词	1
-----------	---

第 1 章	导论 ~ 1
-------	--------

理论的理论: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批判的认识论	2
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起点	10
变化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11

上 编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论 ~ 17
-----	----------------

第 2 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 21
-------	---------------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23
核心特征	27
古典学派的典范	38
激进派的批判	42
保守主义的批判	45
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46
政治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各流派	52
新保守主义	
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	
生态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63
结 论	68

第3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 ~ 70
	传播 71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72
	北美 81
	英国与欧洲 95
	“第三世界”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115
	总结与挑战 127
下编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与更新 ~ 131
	认识论 132
	本体论 134
	理论参数 135
第4章	商品化 ~ 136
	传播的商品形式 141
	内容的商品化
	受众商品
	控制论的商品:内在的商品化
	控制论的商品:延伸的商品化
	劳动的商品化
	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替代性过程 157
	私人生活中的社会过程
	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过程
第5章	空间化 ~ 168
	传播与集中:空间作为制度的延伸 170
	国家 194
	全球化 198
	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社会主义 200

第6章

结构化 ~ 205

社会阶级 210

性别 223

种族 227

社会运动 230

霸权 234

结论 237

第7章

挑战边界: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 ~ 239

引言:界限 240

他山之石:文化研究 243

他山之石:政策研究 246

政治经济学的回应 249

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262

参考书目 ~ 265

译后记 ~ 292

第1章

导论

沟通、传播的价值不在于贡献出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不时展现人类意识格外锐利的一面。

(Williams, 1976:21)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面。在过去50年中,这一领域吸引了全世界许多研究机构的学者。无数的论文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和概况作了重要阐述。^①《传播政治经济学》旨在以一本书的篇幅综合介绍这门学科的内容、成就、论战及其与传播研究其他领域的关系,以填补某些方面的空白。本书先从历史着手,描述并批判政治经济学曾扮演的社会分析通用方法的角色,进而分析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评价它的成就,提出新的发展方向,考察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研究及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虽然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综合介绍政治经济学各主要流派,但它却并不只是对这一领域的概述。除了考察主要的理论,本书还打算重新思考并更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成分。最近在传播研究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如 Curran, 1990; Hardt, 1992; Mattelart & Mattelart, 1992),我所作的反思和更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政治经

① 最近的文章包括了甘地(1992)、瓦斯科(1989)以及戈尔丁和默多克合著(1991)的作品。另见《访谈》(1995)。

济学已在许多课题上,尤其是传播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一点我将主要在第2、第3章进行介绍。这一过程将实现默顿(Merton, 1968)和贝尔(Bell, 1973)提出的知识整理和学科概述。不过本书的目标与他们所指的含义有所不同,因为我已觉察到知识的整理必须与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相联系。这种观点符合威廉斯(Williams, 1976:21-22)的谆谆告诫:

这个学科不是必须学习的传统,不是必须接受的共识,不是因为它是“我们的语言”而具有了天然权威性的一系列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在各方的不同学说中,它是一种形成和重塑活动;我们应用一套词汇来寻找出路,并在创造我们自己的语言和历史的过程中,对它进行必要的修改。

本着这一观点,第4章到第6章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变迁普遍存在,并可以理解为三个动态过程: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这三个过程是研究社会领域的入口或起点。最后,反思与更新意味着考察政治经济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这里指的是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第7章)。

理论的理论: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批判的认识论

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和批判的理论的理论。它提供的就是西蒙尼(Shimony, 1993)所说的整合认识论(integral epistemology)。^②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构成元素是多组主观设定的名义上的范畴,或概念性范畴的物质体现(Garnham, 1990:3)。但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唯名论者或概念论者的观点,而认为存在由感性的观察和解释性的实践共同构成。根据这一学说,现实由我们的所见及我们对自身所见的解释两部分构成。这一学说源自巴赫金(Bakhtin, 1981)的结构语言学和威廉斯(1977)在研究文学理论时提出的社会—历史取向。正如默多克(1989b:226-227)所说,在实践中现实主义者总是尽量避免完全依赖抽象的理论或经验性与解释性的描述,他们给予理论思考和经验思考同等的重视。

② 西蒙尼的学说源于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提出的“描述性的、有条件的和综合性的认识论”,本书的研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库恩(Kuhn,1970)推广了一个观点,即概念、它们在概念体系中的排列及其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能对解释的形成产生影响。理论不只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条目的整理,它帮助我们构建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材料。理论指出这些材料的内部元素的联系,以及这些元素与某些过程和实践的联系,这些过程和实践为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提供了基础(Resnick & Wolff,1987)。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具有特殊的本质,不受任何概念的污染。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解决各种理论上的争端,因为它们并不存在。概念和思想总会延伸到行为和经验事实之中。另一方面,理论是没有生命的,即人们常说的“漫无目的的沉思”,欠缺经验的或解释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事实可以超越理论,表现为实用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所说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迫使概念体系反躬自省,从而要求人们或者为某一概念提供依据证明其合理,或者修改这个概念。然而现实世界中并没有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事实——两者相互渗透。理论上的实践和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实践彼此影响,并受到它们所处的社会实践大环境的制约。所以,本书认为理论和经验性/解释性实践的关系是**多重决定和互相建构的**。^③

对于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所采取的广泛研究取向,本书采用**兼容并蓄的、开放的、非简化论**的角度进行描述。这首先意味着两层含义。第一,理论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纳入其中,这一点不言而喻。任何分析都包含着冲突,我们一方面对社会生活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社会生活中包含了某些因素使我们无法对它进行彻底的了解。尽管掌握完整的知识不是人类力所能及,这个观点仍要求我们尽力理解社会经验。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于是他超越理论而向实践推进;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于是他超越了解释性心理分析转向治疗性刺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第二,没有哪一种研究取向能够独立地构成权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是考察社会生活广泛层面的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又是其他诸取向中的起点或入口。其他取向中包括文化研究和政策研究,它们是处于政治经济学边缘的研究方向。

兼容并蓄的立场对本书结构的两个方面至关重要。第一,本书不是各种观点的概述,也不为某一特定的观点辩护,而是努力领会以上两者的

③ 阿哈麦德(Ahmad,1992:287)在谈到理论时提出,理论若要自我修正,就必须“同时参考事实本身的历史及其自身以前的和现在的构成”。单纯以事实来修正理论的后果“只会是压制。这种压力将持续纠缠并瓦解现有的理论和历史”。用理论来修正事实也会产生同样后果。几百年来,托勒密(Ptolemy)的知识使人们不去反思本体沿完美的轨道绕地球旋转这一理论,却忙于用数学手段凭借他们的观测结果来“修正”事实。

价值。我将尽可能介绍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以及政治经济学家如何探讨传播问题。我知道这种百科全书式或者“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有着很大的局限,尤其是它可能使本书变成政治经济学诸元件的罗列,缺乏结构、过程、联系或结果的论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书介绍了这门学科中的一系列课题和讨论,提供了比较和对照观点的不同方法,从而使书中各部分的价值达到平衡。第二,本书不只是将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重新展示,也不只是试图改变这门学科。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指导下,我希望本书能兼顾上述两个方面。第一部分介绍指导一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及其在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尽管这一部分的目的是概述成就,但我仍然从比较和批判的角度进行描述。本书第二部分从不同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介绍了政策研究和文化研究等边缘学科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强调了反思和更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方法。

兼容并蓄的立场当然内含风险,最根本的风险是本书试图容纳超过一本书的内容。单是这一风险就促使许多作者对他们的写作进行限制,或者以教科书的形式对这门学科进行概述,或者提出新的方法重新对它进行概括,两者只取其一。这些明确的限制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向它们挑战。教科书取向的方法必须假设该学科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立场,或一整套各不相同的立场,至少也要有一系列可供引用的辩论。然而大多数学科,特别是人文领域内的学科,都就各自学科的权威归属问题争论不休。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争论在今天愈演愈烈。若是自限于复述各种学派,那么无异于捍卫一张前苏联的地图,或牛顿关于宇宙运行规律的论述。在一个学术界纷争四起的时代,深刻反思推动学科构建的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显然更有价值。这项工作要求从批判角度反省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二是如何重新构建现有成就,即重新叙述、重新综合、重新思考,并由此进行更新。

这个风险值得一试,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借此获得更大的成就。对认识论、理论、学科属性及政治实践的自觉反省有助于使目前的讨论跳出为“学科之内的学科”定义的狭窄领域,与传播研究现状的讨论以及更重要的当今知识生活状态的讨论接轨。因此,本书力求通过对本学科现状的内省,以及对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人们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的反思,达到兼容并蓄的目的。

兼容并蓄的立场加上现实主义的认识论,为克服二元论提供了武器。二元论的存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无甚裨益。在这方面,本书认同女权主

义者对传统认识论的批评(Harding & Hintikka, 1983; Massey, 1992)。女权主义者认为,二元论的观点“与我们的社会对性别的根本区分有关,与分配给两性的不同特征有关,与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有关”(Massey, 1992:72)。尽管典型的二分法以差别或客体关系为基础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存在与不存在,“A 或非 A”却暗示了一种偏好。二元论不仅鼓励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还拒绝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存在于二元论范围之外的选择。如此一来,二元之外的惟一属性就是混沌,这实际上距一元论更接近。^④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二元论的实例,比如主体和客体、具体和抽象、基础和上层建筑、经验和理论、政治和经济等等。类似的方法也被用来划分特定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例如对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广为人知的区分,还有对《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和《道德情操论》的斯密所作的不那么著名但与此类似的区分。本书采取的方法是兼容并蓄,因此不对某位理论家或某一学派进行具体的、“正确的”解读,而是致力于包容各种不同观点,从而强调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多元思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筛选,但筛选工作必须基于一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非简化论的认识论架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采取明显的非简化论的、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⑤研究取向。受近年来对认识论的批判研究的影响(Outhwaite, 1987; Resnick & Wolff, 1987; Shimony, 1993),本书拒绝将一个人、一种关系、一次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明显复杂性简化成一个核心本质或核心概括,因此,不会做出类似“经济和文化是历史变迁的基本动因,其他的因素都无关紧要”这样的简单论断。另外,本书承袭了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和威廉斯的学术研究,相信理论和社会的定义都是泛化决定或多重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体、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存在由各自和彼此的构建过程决定。我特别赞同威廉斯的解释,他提出决定意味着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用阿哈麦德(1992:6)的话说,决定的作用不是“人前掘井”,而是要“指出个体做出选择、进行生活、创造历史的环境”。采用泛化决定(或者用我更偏好的说法:多重决定)的视角可以避免将孤立的行为当成是完全独立的事物,同时还能强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力。克服了传

④ 梅西(Massey, 1992:75)认为,这并不是说要引入女权主义实在论以代替其他学说。她是这么说的:“问题在于:对时空特性的二分描述,以及前面简要提及的所有二元论与它们内涵的相互联系,都反映并与其他因素一起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所具有的男气和女人气。”

⑤ 除了普遍认识到的泛化决定这一概念的缺陷之外,我对“泛化(over)”这个前缀也有保留意见,因为它带有“过度”的色彩。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多重(multiply)决定一词,尽管它有些拗口,但更加准确。